



农民与

土地

NONGMIN YU TUDI

●王耕今 编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农民与

土地

NONGMIN YU TUDI

●王耕今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与土地/王耕今编,一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6. 6

ISBN 7 - 80636 - 844 - 2

I. 农... II. 王... III. 农村经济—研究资料—汇编—中国—1937~1945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766 号

农民与土地

编 者:王耕今

网 址:www. sxskcb. com

责任编辑:张 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出 版 者: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太原市方正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850mm × 1168mm

邮 编:030012

印 张:3

电 话:0351 - 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68 千字

0351 - 4922085(综合办)

E - mail: Fxxx@sxskcb.com(发行中心)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Web@sxskcb.com(信息室)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Jingjshb@sxskcb.com(综合办)

定 价:6. 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早期的农民运动
(1921年7月~1925年五卅运动) /1

第二章 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1927年八一起义) /10

第三章 苏区的土地革命
(1927年~1937年) /26

第四章 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1937年~1945年) /48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1945年~1949年) /61

第六章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
(1949年~1952年) /74

序

薛暮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至今仍然对我们了解情况，决定政策，具有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我从1943年3月起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分局除要求我帮助山东进行对敌货币斗争和建立工商管理外，还要求我研究如何正确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路过山东时，曾对山东工作做了全面指示，山东分局根据指示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开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我们了解运动进展情况，做出进一步的指导。为此，我一到任就立即组织干部在以莒南为中心的滨海区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这个地区是山东分局所在地）。为了正确执行党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土政策，我在包括调查研究室干部在内的山东分局干部会上做了《中国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研究》的专题报告，接着利用我过去多年农村经济调查的经验，立即为调查研究室拟订调查提纲，讲解调查方法。虽然我带领的是一队新兵，但在短短近三年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卓有成效的调查，由组长王耕今同志写出的几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由耕今同志经历千辛万苦保存了四十多年，

1988年3月由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村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内部印发。现在准备由出版社公开发行,耕今同志请我写个序。

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山东分局和省政府了解情况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决定减租减息政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山东省分成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5个行政区,除由山东分局和省政府直接领导的滨海、鲁中、鲁南外,当时横隔着胶济铁路敌占区的胶东、渤海,也各自做了一些类似的调查,并颁发了一些有关减租减息等政策的具体法令。这些文件,除《民主导报》已发表者外,都已散失,这是保存下来的调查材料的最宝贵的一份。当时山东各地的土地关系和租佃、借贷、雇佣等类制度大体相同,略有差别,这份调查资料,不仅详实地反映了滨海区的情况,也大体上反映了山东其他各行政区的情况,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1944年8~9月,山东省政府(当时称战地工作委员会)召开有各县县长参加的行政工作会议,减租减息是此次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省政府主席黎玉同志因为我经过一年多调查研究,比较熟悉山东各地区的农村情况,要求我代表他做了《关于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报告分思想政策检讨、减租问题、减息问题、增资问题、土地纠纷等几个部分,讲了3个半天(约12小时)。现在翻阅这个报告,对山东省当时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情况和几年来的变化、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说得如此详细,连我自己重阅时也感到惊讶。这些思想的来源,无疑是来自这些调查报告,这证明这些调查对分局和省政府决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已经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书中发表。如果把这报告来同这本调查资料参照阅读,对这本调查资料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我认为值得把这些调查资料公开印发,供给学者们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农村

的经济,也使下一代的人了解当时的情况。

山东省对收集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资料是十分认真的,仅我收到的已有《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6辑,《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4册。我希望有关部门能从《大众日报》、《民生导报》、《斗争生活》和其他档案资料(现在这些资料也已经很难找到),收集有关土地问题和减租减息政策、农业生产和工商管理等工作等类问题的有关历史资料,分别整理,传之后人,使它不致长此散失。

1988年9月5日

(本文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序言)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大的统治者，它们通过买办、军阀、官僚的掠夺和剥削，阻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极其缓慢，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主要靠耕种土地为生，而土地分配又极不合理。据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6省(区)农户的统计比较：在1721万多农户中，占有耕地10亩以下的占38.2%，11亩以上的占28.6%，据李氏引证《金陵大学丛刊》第八号芜湖102户调查，10亩以下者(平均7.5亩)占总农户的13.7%，11亩以上的(平均15亩)占50%，而这两种小农户占63.7%。地主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掌握着政权，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困农民不得不忍受高额地租租种地主的土地，而且还须忍受地主们的政治压迫。佃种地主的土地，租额一般都在收获量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送节礼、出工役等负担，许多贫苦佃农，除去开支所余无几，终岁勤苦，难得温饱。据彭湃于1924年《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中说：每一年壮年农民至多可耕种1石种的农田，中等年成收谷30~32石，每石价6元，除20石缴地主，所余10石，值60~70元。其开支计：年需两季肥料30元，种籽约5元，农具消耗约5元，共40元，尚余20

~30元。一个单身壮年，每食至少要6个铜板，其余衣食住费用不计，吃饭年需54元，收支相抵，亏20~30元。缴不上租，即须借高利贷，当年不还，利上加利，越滚越多，往往成为终身还不清的“阎王债”。帝国主义的洋货，侵入中国市场，挤垮了农村的手工业，又堵死了农民的一条生活出路。英美日俄法等帝国主义者在 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掌握着我国工矿、交通、银行、商业等经济大权。它们一方面用不等价的手段掠夺我国经济资源；一方面又给地方军阀以武器和贷款，使各系军阀进行无休止的内战。战祸连结，兵匪骚扰，抓兵拉夫，差役捐税，都直接间接地加在贫苦农民的身上。农民负担越重，生产投资也越少，产量也越低。如遇凶年饥岁，农产失收，生活无着，地主逼租逼债，贫苦农民走投无路，只好鬻儿卖女，或逃奔他乡。“老弱转呼于沟壑，壮者散之于四方”，就是当时贫苦农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做了普遍的调查分析，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担负不了这个革命的领导任务，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必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参加的革命。革命的主要阵地在农村，“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李大钊也指出：“耕地农有”是广大贫苦群众的迫切要求，并且提出：“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证其阶级的利益。”

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密切联系的。在一定情况下农

民组织起来以进行土地革命及反对封建地主为主；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主。这两种斗争，此起彼伏，相互结合。由于反动势力不愿放弃它们的权益，每一次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遭到它们的武装镇压，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然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同时，也是夺取政权的激烈的斗争。

中国的封建势力，有几千年的历史，有长期的统治和剥削的经验。近代以来，又同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因此，反对封建势力完成土地革命的斗争，必然是一个异常复杂和艰巨的斗争。从1921年沈玄庐领导的农民减租斗争和1922年彭湃领导的农民减租抗税斗争，到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经历了三十多年曲折的艰苦奋斗，农民从被剥削被奴役的压迫下，得到了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斗争的胜利，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斗争的胜利，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洪流汇合的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农民翻身解放是一部伟大斗争的历史。我们选辑了三十年来的部分文献，按照时期编辑起来，并分期对文献做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可以看出这一伟大斗争的概貌，使不了解农民翻身艰苦斗争历程的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知道我们的老一代人如何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获得了土地，做了国家的主人。了解过去，有助于认识现在，并正确的瞻望未来，使我们能够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胜利前进。

下面分六个时期(六章)作简要的说明：第一章，早期的农民运动；第二章，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章，苏区的土地革命；第四章，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第五章，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第六章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

第一章 早期的农民运动

(1921年7月~1925年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从诞生之日,就同农民运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建党初期,就把解决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一项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第四期发表的《告中国农民》中曾指出:“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预备期和革命实行期,他们都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号召“党员深入到农村去,向农民进行宣传,提高农民的觉悟,并急切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夺回被地主抢去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归社会公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联合战线。特别指出:“大量的受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局部地区发动了农民的减租减税运动。浙江萧山沈玄庐和广东海丰彭湃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组织农民协会的领导人。

沈玄庐是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人,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产。1921年夏,沈玄庐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农村宣传革命道理,公开表示不要佃户缴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沈玄庐以衙前村为中心,开展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他向农民发表观点鲜明通俗易懂的演说,号召农民“赶快团结

呵！你们要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见《新青年》第9卷，第2期）。他的演说在萧山农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沈玄庐等人还仿效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的办法，办起了衙前农村小学，作为筹办农民协会的准备。衙前农村小学，不仅教文化，而且以多种形式宣传和讲解农民要争取翻身解放的道理。经过广泛地教育、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于1921年9月27日宣告成立。

衙前村农民协会公布和宣传了农会的章程，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要求和愿望，说明了农民的种种痛苦和产生痛苦的原因。提出：“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厄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中国人的命运。”还提出“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应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管理分配”（《新青年》第5卷，第4期）。

衙前村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四周乡村。1921年冬，萧山、绍兴80余村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建立起农民协会的组织。秋收后，衙前村农民协会根据当年收成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向地主提出“减租4折”的要求。地主又恨又怕，慑于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迟迟不敢下乡收租，经过多方调解协商，双方同意6折收租。减租斗争的初步胜利，长了农民的志气，打击了地主的气焰。

以衙前村农民协会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受到地主阶级的疯狂仇视。地主豪绅串通反动军队和官府，经过秘密策划，于1921年12月中旬，派出军警包围衙前村，武力解散农民协会，打伤农民协会积极分子多人，逮捕农民协会领导20余人。农民协会委员李成虎被捕后备受折磨，惨死狱中。从此，衙前村一带的农民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深远的一次现代农民运动。海丰农民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员、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他生于海丰县海城镇桥东社一个大地主

的家庭。彭湃自己说：“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千余担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 1500 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下 30 口，平均每一人有 50 个农民做奴隶。”（《彭湃文集》，第 111 ~ 112 页）生长在这样家庭的彭湃，并没有沉迷于那种富有的寄生生活，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痛恨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豪绅仗仗权势欺压农民群众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深表同情。从日本回海丰后，他拒绝了军阀陈炯明高官厚禄的引诱，决心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决心献身于农民运动。

海丰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由于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官府的苛捐杂税的勒索压迫，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历史上就有多次农民起义的记载。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陈炯明当上了粤军总司令，统治了广东。海丰是陈炯明的老家，陈的家庭和当地的豪绅、买办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占兼并农民的土地，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当时海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苛捐杂税多如毛，家在深山也难逃。”（《彭湃传》，第 50 页）陈炯明部队的军饷在 1920 年已预征到 1930 年。加之地主豪绅任意升租、放高利贷，土地日益集中，农民纷纷破产，甚至家破人亡。农民的生活，“一年到暗（头），凄凉艰苦”（《彭湃传》，第 51 页）。军阀地主的重重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农民的深仇大恨。

1922 年，彭湃发表了他写的《农民利益传单》，提出了维护农

分了家,并把分得的土地分给了佃户;他还曾用自己的钱为农民赎回了出卖的妻子等等,取得了农民群众的信任,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农民把他看做自己人,称他为“阿湃”。

在彭湃的发动和领导下,在1922年7月29日建立了海丰县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农会。由彭湃、张妈安、林沛、林焕、李志田和李思贤等组成的“六人农会”,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海丰农民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标志着海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进入有组织斗争的新阶段。

彭湃在建立农会后,更深入农村,对农民讲解减租的道理和斗争方法,并防止军警勒索调解农民中的争端,救济贫困,禁止烟赌,奖励学习,改良农业,防止盗贼,扩大农会影响,发展农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不仅农民的觉悟提高,农会的组织扩大,而且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也同情农会,并参加到农民群众的行动中来。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农会会员从6人发展到50人。很隆重地成立了赤山约农会(“约”相当于一个大乡)。制定了会章,推选黄凤麟为会长,多个会员都发有印着“不劳者,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证章。农会成为团结教育农民的有力组织。

农会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农会组织迅速扩大,由赤山约一个农会发展为守望、银溪、西河、北笏、罗山、青湖、平岗、汀洲、雷峰等12个农会,包括98个乡,2760户,16590多名会员。会员多是佃农,自耕农入会的很少。

农会在海丰开了一家西药店,由决心同彭湃一起开展农民运动的吕楚雄任医师,会员看病半价收费(《彭湃传》,第65页)。同时农会领导农民对地主进行斗争,免除了地主坑害农民的“三下盖”(地主收租时,谷子装满斗后,用粗大的斗盖在斗旁敲打,反复敲三次,将斗内的稻谷压得实实的)、“伙头鸡”(地主下乡收租时,佃户必须杀鸡款待他)

(《彭湃传,第56页》)等弊端。减轻剥削,受惠不少,深得农民欢迎,许多农民愿意参加农会。此时,时机成熟,乃于1922年8月1日正式成立了海丰县农会。县农会发表宣言,指出: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人类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着我们辛苦生产出来的粮食。可是,农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与饥饿压迫恶战苦斗以维残命;而地主的掠夺,军警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常此隐忍,社会灭亡,不待我农民一个阶级!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

海丰农会成立后,在附近各县影响极大,海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农民,纷纷参加农会,会员达10余万人,海丰农会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联合会范围渐广,于1923年7月,改称广东农会,并公布了《广东农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规定的4条纲领是:“(1)谋农民生活之改造。(2)谋农业之发展。(3)谋农村之自治。(4)谋农民教育之普及。”《章程》共10章33条。设执行委员会,下设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10个部;还规定了农会的12项“会务”,即:防止地主升租,岁款或生活程度过高向地主请减租额,调解会员争执以免讼累,禁止会员赌博及吸食鸦片,办理各乡农民学校等教育事业,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设立医院办理育婴养老事项,调查农村户口、耕地、产量,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等经济事项,饲养耕牛,办理农团以防盗贼抢

卫团长林卓存，命他的侄儿到北笏乡说：“官税无减，十足照收。”并借势逞威，暴跳怒骂。农民据理恳请减免。林某逼租未遂，县长王作新派武装人员 20 余名，到北笏乡围捕乡民，搜屋掠物，还强索差礼银 30 元，掳去乡民戴阿扶等 3 人，镣锁投狱。

8 月 16 日，县长王作新伙同粮业维持会士绅，勾结军队，带领军警百余名，围捕农会会员，掳去农会职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 25 人，送入监狱管押，农会的文卷、器具、现金等物均被没收。同日，还宣布解散农会，收缴农会会员证章，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苏等，查封农会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军警多方勒索，百般骚扰，农民生机，陷于困境。

彭湃及各地农会向报界发出呼吁，要求声援，舆论大哗。海丰县政府慑于群众组织的声势和某些上层当局人物害怕舆论界的指责，释放了农会被捕人员。当被捕会员释放归来时，彭湃邀集各地农民列队欢迎。同时召集各乡代表讨论复会，并派代表请求陈炯明准予复会。陈炯明不得不对代表说：“农民焉能无会，旧日农会可以恢复下去。”农会乃于 1924 年 3 月 5 日恢复，农民极为欢跃，并演戏开大会，庆祝农会恢复。农会的恢复，鼓舞了江东各地农民的热情，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的农民也纷纷参加农会，农会的声威大震，引起了陈炯明等的恐惧。军阀陈炯明突然派人来制止群众开会演戏。3 月 21 日海丰县长王作新出布告，禁止集会，谓：“嗣后，为有敢在外私行集会，借端煽动者，一经察觉，完即拘案究办，决不宽贷。”这些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极大痛恨，大骂政府和绅士摧残农民运动。

1923 年冬，海丰第三区的大地主对佃户异常苛刻，屡屡升租，不遂则收回田地，10 年中每亩田租竟由五六担升至 20 担，佃户租种田地，终岁不得温饱。三区农会会员，联合几个乡的佃户一起，首先向 1 户恶霸地主辞田，接着 1000 多户佃农辞田，地主感到恐

慌,初以收田相威胁,农民依靠农会的组织同他斗争,几经周折,地主不得已,答应佃户要求,平均约减低租额 15%。该处六七个乡,每年减少租谷 400 余石。其他乡按三区农民的办法,进行减租,也获得了胜利。此后,农民组织了自卫武装,地主豪绅受到很大威胁,也引起军阀们更大的注意。1924 年 11 月 30 日,广宁农民约定在县城集合,准备实行减租,地主江汉英纠集土匪,乘机进攻潭布,农民自卫军与之战斗数小时,土匪是乌合之众,几次进攻,均遭自卫军顽强抵抗,未能得逞。广宁十三区地主组织民团雇用土匪,下乡骚扰,武装收租,农民自卫军以“生为农会人,死为农会鬼”的顽强精神,顶住了地主武装的收租和骚扰。

但是,当时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地主豪绅与军阀土匪相互勾结,镇压农民解散农会,迫使农民的斗争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反动派的镇压,并没有把觉醒了的农民吓倒,使他们更加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同反动派作斗争,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斗争才能一直坚持下去(《彭湃传》,第 95~97 页)。海丰一带农民斗争的光辉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当时周恩来留学欧洲,曾在《赤光》杂志撰文,赞扬海丰的农民运动,他说:“海丰百万农民的反抗运动,引起了地主的恐慌。”它证明:“农民是一支庞大的力量,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加入革命战线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虽然只限于部分地区,组织尚不完善,斗争策略也还不够成熟,但这是新型农民运动的开端